

海内第一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刘熊碑》考述

——兼论《刘熊碑》的金石学传播

李瑞振

内容提要：刻立于东汉时期的《刘熊碑》，其碑石早佚。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卷轴装宋拓《刘熊碑》，与北京故宫所藏《刘熊碑》卷轴装宋拓本是目前仅存的两种《刘熊碑》较完整拓本^[1]。从版本价值来看，国博此本在内容上相对更加完整，其存字较故宫本多出约14字，罗振玉将其命名为“海内第一本”，诚非虚誉！更难得国博本题跋多达23则，晚清民国的一时之名流纷纷援笔落墨，愈令此本踵事增华。国博本历经刘鹗、端方、完颜衡永等人递藏，可谓名家迭继，绵绵不绝，堪称古代碑帖中的无上妙品！历代文人学者和金石书画家们围绕《刘熊碑》及其拓本，通过著录、收藏、双钩、临摹等多种方式，塑造了《刘熊碑》的金石传播史。

关键词：《刘熊碑》 刘鹗 宋拓 题跋 双钩

一、碑石概述

(一) 碑刻概况

《刘熊碑》，全称为《汉酸枣令刘熊碑》，亦称《刘孟阳碑》《俞乡侯季子碑》，碑文为隶书，刻立于东汉末年。碑石原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南宋末期，碑石残断，仅剩两段残石，后残石亦不知所踪。关于刻石亡佚的时间，据清代杨守敬推测，当佚失于明代中叶：

《刘熊碑》明人尚有著录，是碑之亡，当在明代中叶。^[2]

1915年，金石学者顾燮光在河南延津县城之学宫旧址寻获一块《刘熊碑》残石，因为碑阳部分长期用作捶打石，故文字已经毁坏不可见，仅存碑阴8行50余字，上刻部分捐资题名者的职官、姓名以及捐资数目。此外，这块碑阴残石侧面还刻有8行共24字宋人之题跋。碑阴残石今存于河南省延津县文化馆。

[1] 除了国博藏刘铁云旧藏本和北京故宫藏天一阁本之外，尚有其他几种《刘熊碑》拓本，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拓本或下落不明，或残缺严重，与国博本和故宫本无法相提并论。

[2]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册，第1075页。

此碑碑石虽然早佚，幸赖文献中尚有相关之记载，可以让我们得窥刻石之具体情况。据南宋洪适的《隶释》卷五之“酸枣令刘熊碑”记载，此碑分为碑阳和碑阴，均刻有隶书文字，碑阳文字记载刘熊德政，碑阴记载了一百八十余位捐资者题名。依洪适所记，南宋时的《刘熊碑》全文共670字，缺43字；碑额为篆书，南宋时仅见右侧一行，残存“枣令刘”三字。另据唐代诗人王建《题酸枣令刘熊碑》诗中的“苍苔满字土埋龟”来看，此碑应该为龟趺。后来的学者根据《隶释》记载和残碑拓本之行次，推断出碑阳文字为23行，行30余字。碑文无撰人、书人之姓名。

（二）碑刻内容

《刘熊碑》碑文所讲述的是东汉时期河南酸枣县令刘熊的政治功绩，文中极尽赞美之词。

河南延津县，古称“酸枣县”。秦始皇五年（前242），实行郡县制，以河南延津多棘，置酸枣县，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西南。至汉代，仍袭酸枣县，宋代改为延津县。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最早记载了《刘熊碑》在酸枣县城的情况：

酸枣以棘名邦，故曰酸枣也……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1]

刘熊，生卒年不详；字孟阳，江苏广陵海西（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东南）人；东汉光帝刘秀玄孙。碑文主体分为序文和铭文两大部分^[2]。第一部分序文是以骈、散文结合方式记述了刘熊的“德政”。首先记叙了刘熊的身世，“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其次重点叙述了刘熊“德政”的具体体现：一曰体察民情，“约之以礼，博之以文，政敦始初，慎徽五典，勤恤民殷”；二曰砥砺劝学，“帅厉后学，致之雍泮”；三曰轻徭薄赋，“富者不独逸乐，贫者口顺四时。积和感畅，岁为丰穰，赋税不烦，实我刘父”。由于刘熊施行德政，因此，当地官民对他敬爱有加，“吏民爱若慈父，畏若神明”。第二大部分是铭文，“刊诗三章”，每首诗14句，每句4字，共168字。表达了对碑主刘熊的赞美。

（三）历代著录

历代文献对《刘熊碑》著录较多，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欧阳修之子欧阳棐《集古录目》卷二、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九，南宋洪适《隶释》卷五、陈思《宝刻丛编》卷一，明代杨慎《金石古文》卷七、都穆《金薤琳琅》卷六，清代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卷二、王昶《金石萃编》卷十九、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卷一、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二等均有相关著录。

《刘熊碑》记载的内容涉及皇族世系等重要史事，加上其隶书书法结体超逸旷达，笔法方圆兼

[1]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页。

[2] 关于汉碑的序文与铭文，清人姚鼐曾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玕具之矣……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圻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词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乃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见清·姚鼐编纂；胡士明、李祚唐校点：《古文辞类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济,是汉碑中的上乘之作,因此备受学者推崇。清代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称:“是碑(《刘熊碑》)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清人杨守敬在其《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一“酸枣令刘熊碑”条目下称此碑“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1]

(四) 相关传本

《刘熊碑》刻石虽佚,幸赖有拓本、摹本等多种形态的版本流传于世。

综合来看,《刘熊碑》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原石拓本和翻刻本、钩摹本两大版本系统。

其一是原石拓本。原石拓本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两片残石合装拓本,合装本存字字数较多,计约三百六七十字。主要代表是国家博物馆藏刘鹗本和北京故宫藏清末范懋政题签天一阁本,两者比较而言,刘鹗旧藏本因为存字更多,略胜于范懋政旧藏本。^[2]原石拓本还有一种是只有下半片拓本,其存字只有200余字,主要代表就是汪中(容甫)旧藏本(今归台湾蒋氏密韵楼^[3])。此外,还有一种拓本属于原石拓本,那就是1915年顾燮光访得的碑阴拓本,这种拓本比较常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不少单位和个人都收藏有这种拓本。

其二是翻刻本和钩摹本。翻刻本和钩摹本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两片残石合装本,如清代书画大家赵之谦钩摹本,其钩摹的底本是天一阁宋拓本,赵氏钩摹的细节与天一阁本有明显差别,有民国印本。还有一种是下半片残石的翻刻本或摹本,这种传本较多,如沈树鏞(均初)本、巴慰祖本、江德量(秋史)本、翁方纲本,都是这一类本子,仅存二百余字。

表1 《刘熊碑》版本情况一览表

版本	名称	存字数	形态	现藏地
原石拓本	刘鹗旧藏本	378	拓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一阁旧藏本	364	拓本	故宫博物院
	汪中旧藏本	245	拓本	台湾蒋孝瑀处
	顾燮光访得碑阴本	54	拓本	国家图书馆等 ^[4]

[1] 清·杨守敬著、赵树鹏点校:《学书述言:外二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71页。

[2] 王壮弘先生曾目验故宫藏范懋政旧藏本,认为依据纸墨特征来看,此本为明中叶以后拓本。见清·方若原著、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3] 汪中藏宋拓《刘熊碑》归蒋毅孙后,蒋曾把沈均初本和汪本进行过对比,他认为沈本“非真本”,而自己所藏的汪本为“宋拓真本”:“此沈郑斋藏本,后归武进费氏,甸斋督两江时,费子怡猷之宝华庵中,时甸斋新得刘铁云之整纸本也。辛亥后,闽县陈淮生承修得之,在沪时曾屡见之,审其纸墨,不过百余年前物耳。陈氏所藏诸碑,皆请罗叔言审定题识,独此本罗氏审为覆刻,未着一字。而义州李文石氏仅书王建一诗于册尾,盖亦心知其非真本也。戊申冬,静公为作缘,得汪容甫之宋拓真本,在借石印本对勘一过,乃知两家真鉴,非陈氏所能及。碑后附装伪叔双钩天一阁本甚精,惜未印行。甸斋之整纸本存字最多,三十年前见之衡亮生处,曾请宝瑞老代为议值而未成。世间刘熊碑拓本天一阁本外,皆得见之,墨缘为不浅矣。岷翁。”见台静农著:《台静农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4] 据许承尧“歙之金石家”中记载:“汪中(容甫)藏宋拓《刘熊碑》,多出巴子籍本二十八字,补洪氏所阙者十三字,正其误者一字。”见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40页。汪容甫本后归蒋毅孙,蒋传其子孝瑀,蒋孝瑀于1978年请甲骨学家严一萍协助,经由艺文印书馆印行。从艺文印书馆的印本来看,汪容甫旧藏此本点画神完气足,笔意浑厚弥满,系为原石所拓,只可惜存字较少。见蒋孝瑀著:《北宋拓刘熊碑》,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

(续表)

版本	名称	存字数	形态	现藏地
翻刻本、钩摹本	沈树镛旧藏本	245	拓本	私人 ^[1]
	巴慰祖双钩本	217	钩摹本	国家图书馆等藏印本
	翁方纲双钩本	243	钩摹本	国家图书馆等藏印本
	江德量旧藏本	245	钩摹本	不详 ^[2]
	赵之谦双钩本	364	钩摹本	国家图书馆等藏印本

二、既往之研究

据目前所见,《刘熊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数种。

1966年,启功先生以笔名“少文”发表了《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问题》,基本厘清了《刘熊碑》托名为东汉蔡邕的问题,认定此碑为“一位无名书家所写”。^[3]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碑帖研究专家蒋文光先生撰写了《东汉刘熊碑的书法艺术——兼谈海内第一本附诸家跋》一文,对刘鹗旧藏宋拓《刘熊碑》的书法艺术进行了论述,并择要整理了拓本上的部分重要题跋。^[4]

1988年、1991年、1993年,《考古》杂志陆续刊发了三篇文章,对《刘熊碑》的碑文内容、特别是刘熊的家世进行了讨论。1988年,李发林先生发表了《汉碑偶识》一文,考察了刘熊的家世,并认为碑文有误刻的问题;1991年,陈奇猷先生发表了《读〈汉碑偶识〉质疑》对李文进行了商榷,认为碑文无误;1993年,王戎先生发表了《〈刘熊碑〉释读正误》,也对李文所言碑文内容进行了讨论,对刘熊的家世进行了梳理。

2009年,书画鉴定家马宝山先生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一书的“汉《刘熊碑》及收购经过”章节中首次谈到了从收藏家完颜衡永处征集刘鹗旧藏宋拓《刘熊碑》的历史过程。^[5]2013年,马宝山的“徒弟”黄秀纯先生撰写了《收购文物趣谈》,再一次谈到了文物征集工作者“巧妙”征集刘鹗旧藏宋拓《刘熊碑》的具体情况,记录了更多的历史细节,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2015年,秦多可先生撰写了《汉刘熊碑拓跋文解读和版本浅析》,对刘鹗旧藏宋拓《刘熊碑》的题跋和版本进行了简要梳理。

[1] 沈树镛旧藏此拓本与赵之谦双钩本曾经于2018年出现在广州华艺2018春季拍卖会上。

[2] 据清人钱泳记载,江德量本是在巴慰祖本和汪中本的基础上双钩而成:“酈道元《水经》载酸枣城有县令《刘孟阳碑》,即是碑也。曩时见歙县巴隍堂氏有双钩本,既又见扬州汪容甫家有宋拓原本,虽经残蚀,其字较多于巴氏,且有出于洪《释》之外者。后江秋史又为双钩,以巴、汪两家合参之,然总缺上半截。后见明州天一阁旧拓本,有‘君谔熊字孟阳’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等字,则知江秋史所钩是下半截也。”见清·钱泳著:《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3] 少文:《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问题》,《文物》1966年第5期。

[4] 蒋文光先生此文为油印本,系《中国汉代碑刻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1988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山东曲阜举办“中国汉代碑刻学术讨论会”。

[5] 马宝山著:《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2019年,郭怀宇先生撰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刘熊碑〉(宋拓本)》一文,介绍了国家博物馆藏宋拓《刘熊碑》的基本情况。同年,柳向春先生发表了《〈汉酸枣令刘熊碑〉二题》一文,对故宫所藏拓本和《刘熊碑》的刻立时间进行了讨论。^[1]

综上所述,诸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刘熊碑》碑文内容(刘熊家世)以及书碑者的考察,二是《刘熊碑》拓本的相关研究。这其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鹗旧藏宋拓《刘熊碑》成为大家研究的焦点,如蒋文光、马宝山、黄秀纯、秦多可、郭怀宇等先生的研究均属此类。

三、国博藏宋拓《刘熊碑》

(一) 拓本概况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刘熊碑》,一轴,整幅卷轴装,白棉纸,重墨拓。卷轴内分上、下两部分装裱了墨心两片,上片大体为正方形,高56厘米、宽73厘米,存字15行,每行最多者12字,共存153字;下片为不规则形状,高81.2厘米、宽115.5厘米,存字22行,每行最多者15字,共存225字。两片拓本共存字378字。拓本四周布满诸家题跋。(图1)

(二) 拓本流传

国博所藏此拓本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帖贾发现于江苏省宝应县邗上成氏^[2]故纸堆中;7月,此《刘熊碑》拓本为刘鹗(铁云)所得,刘铁云请好友罗振玉篆首并题跋,罗氏推此本为“海内第一本”;1907年3月,此本归端方,端方遍邀杨守敬、罗振玉、郑孝胥、李葆恂等诸多名家题跋此卷;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旧藏星散,此本又转归完颜衡永;1965年,衡永去世,此本由北京文物商店庆云堂所得;1966年,北京庆云堂将此本售归中国历史博物馆。

(三) 拓本版本

国博藏《刘熊碑》碑阳拓本,分为上、下两片;中部有较大面积的文字残缺。由于传世较完整的拓本仅见国博本和故宫本两种,因此我们将这两种拓本进行了校勘。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本《刘熊碑》,收购于1957年。在20世纪50年代,唐兰和马子云先生就将其列为故宫碑拓的顶级藏品:“拓本流传只有两本,此为范氏天一阁旧藏,宋时黑墨精拓,定为珍品甲。此拓本原为剪粘本,后恢复整张。碑已残为两块,上段十五行,行十至十一二字不等。下段二十二行,行十至十一,二、三、四、五字不等。题签一,道光二十三年范懋政书。印章四,沈德寿秘宝二方,补兰轩金石图书记二方。”^[3]由此可见,即便是善拓云集的大收藏单位,东汉《刘熊

[1] 柳向春:《〈汉酸枣令刘熊碑〉二题》,范景中、曹意强、刘赦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23—24),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7页。

[2] 乙之先生在其《海内第一本汉〈刘熊碑〉读后》一文中认为此成氏或为成静生家。见乙之著:《海内第一本汉〈刘熊碑〉读后》,《书谱珍藏本》(1974—1990,26,1979·1),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3] 柳向春:《〈汉酸枣令刘熊碑〉二题》,《美术史与观念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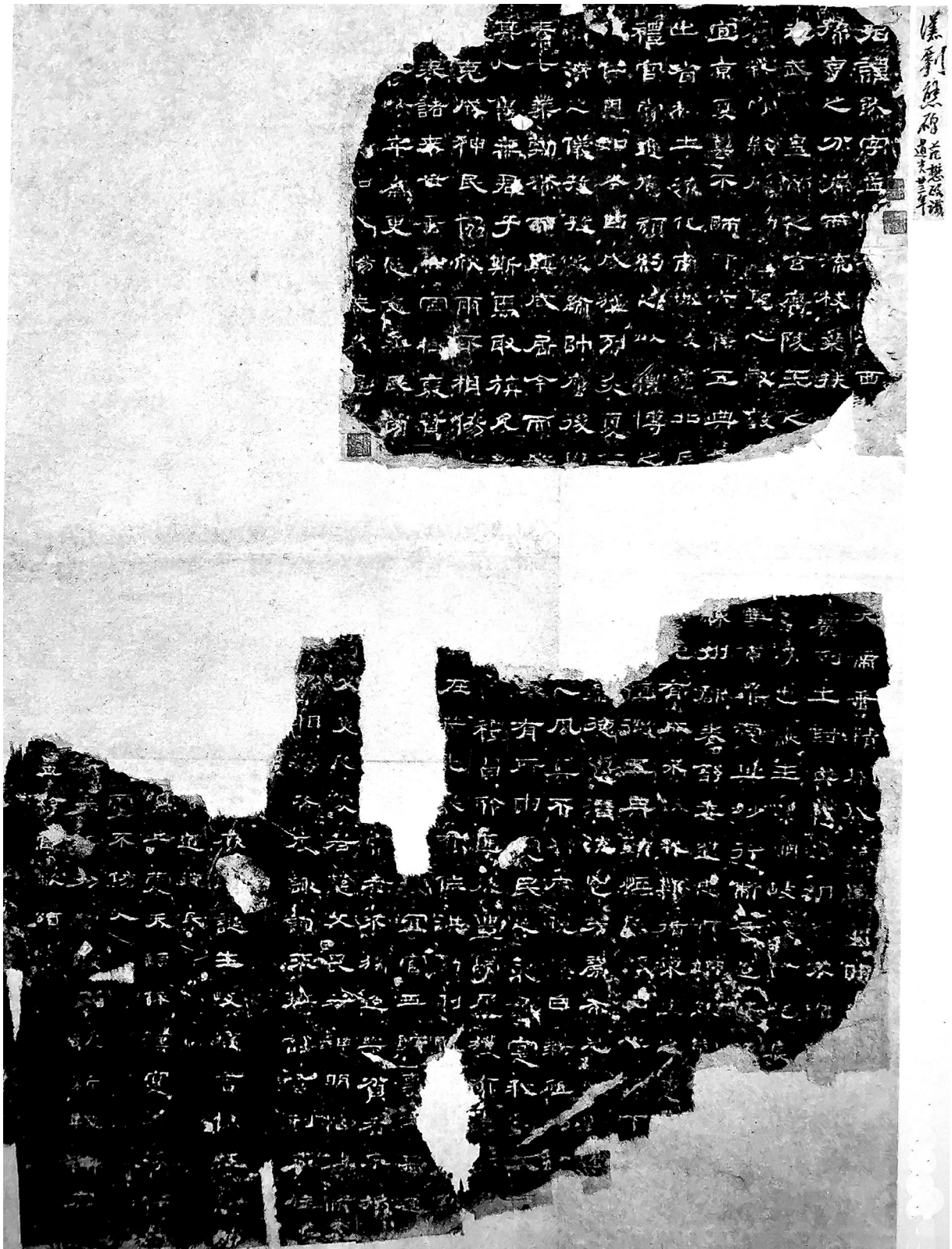


图2 故宫博物院藏天一阁本宋拓《刘熊碑》

碑》拓本也是墨林至宝，备受学者专家们的珍视！

首先，将国博本上片拓本与故宫本（图2）对比来看，差别并不太大，主要差别在左上角，左起第十二行“载克成”之“载”字和第十三行“刻表诸来世”之“刻”字，国博本尚有笔画可辨，故宫本完全不可见。

其次，将国博本下片拓本与故宫本对比，二者差距则较为明显，第12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之“昔先民”3字故宫本残缺不全，国博本完整；第13行“式序在位，量能授宜”之“式序在位量能授”7字故宫本缺失，国博本除“量”字损泐较为严重之外，其他6字尚存；第14行“造设门更，富者不独逸乐”之“造设门更”4字故宫本缺失，国博本尚存。另外，下片拓本底部，第6行“循东里之惠”之“之惠”2字故宫本基本可辨，而国博本则残损不完；第7行“勤恤民殷，心顾下”之“心顾下”3字故宫本尚依稀可辨，国博本残缺不见；第12行“洪勋则甄，盛德刻表”之“甄盛德”3字故宫本缺失，国博本存。

综上所述，《刘熊碑》碑文中共有约19字国博本尚存，而故宫本缺失；另外，碑文中共有5字在故宫本中尚存，而国博本则缺失。由此可见，国博本和故宫本各有优长。

整体而言，国博本存378字，故宫本存364字，国博本存字较故宫本多出约14字。我们对这两种拓本所缺失的文字部分进行了辨析，发现其各自缺失之字并非是因为拓制时间早晚所导致，而是由于各自最终装裱前对拓本保存不善，才导致了部分拓本文字遗失。对比这两种拓本的文字及石花损泐细节来看，二者传拓年代接近。

（四）相关铃印

国博所藏宋拓《刘熊碑》拓本，全本铃印计约35枚。其铃印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拓本上的鉴藏铃印，另一类是题跋部分的落款铃印。

拓本上所铃鉴藏印共10枚，上、下墨心各5枚。上片墨心铃：“铁云长寿”白文方印、“衡永寿同金石”白文方印、“湘南审定”朱文方印、“湘南墨缘”朱文随形印、“衡酒仙读碑记”朱文方印。下片墨心铃：“酒仙长物”朱文方印、“酒仙之玺”白文方印、“铁云长寿”白文方印、“衡永长寿”白文方印、“酒仙所藏金石”白文方印。

这10枚鉴藏印的主人分别是刘鹗和完颜衡永二人，“湘南墨缘”“酒仙之玺”等均为完颜衡永用印。

题跋相关铃印计约25枚，分别为罗振玉、王瓘、杨守敬、缪荃孙、李瑞清、张玮等题跋者所铃姓名、字号印。

（五）题签、题跋

《刘熊碑》卷轴有篆书题签（外签）一枚，为罗振玉于宣统二年（1910）为端方所题写：“《海内第一本汉刘熊碑》。宣统二年冬，匍斋尚书命上虞罗振玉署题。”（图3）通过这个卷轴题签和卷轴内杨守敬于1907年3月所书题跋中“据陶公言，得此时尚是未装裱本”来看，这个卷轴应该是端方于1906年8月（王瓘为刘鹗题跋《刘熊碑》落款时间）至1907年3月（杨守敬为端方题跋《刘熊碑》最早落款时间）之间装裱完成，也就是说现在国博本宋拓《刘熊碑》卷轴的装裱形态是清末

裱本。

通观此本，拓本题跋共计23则，我们依照题跋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了全面整理。这些题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刘鹗收藏时期的题跋；二是端方收藏时期的题跋；三是完颜衡永收藏时期的题跋。其中，端方收藏时期的题跋最为丰富。

第一时期，即刘鹗收藏时期。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近代小说家，富于金石、甲骨收藏。撰有长篇小说《老残游记》，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刘鹗收藏时期，主要有罗振玉和王瓘二人在拓本上题跋。刘铁云视《刘熊碑》拓本为斋中至宝，在其《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残页）目录中，他列举了所藏珍贵拓本24种，其中多为孤本、初拓本、最佳拓本，而《海内第一本刘熊碑》列为第一！^[1]罗振玉和王瓘先后为刘鹗所藏拓本书写题跋。

题跋一为罗振玉于1906年7月下旬所作楷书：



图3 国博本罗振玉篆书题签（外签）

汉刘熊碑海内第一本（篆书题端）。^[2]《刘熊碑》，玉平生所见凡二本：一范氏天一阁本；一沈均初藏本。天一阁本于十七年前见之越中，不甚记忆，但记所存仅百余字。沈本存费西蠡许，存字较多，然神采殊乏，曩颇疑是复刻；且以纸墨观之，亦二百年物耳。至海内久著称之巴慰祖、江秋史、汪庸夫三家藏本，虽未得见，然翁苏斋双钩本，实会合三本而成，其存字二百四十有三，号称最多字。今此本存字，则较三家合摹本，多三之一，而精采焕发，足证沈本确是复刻！然则此本谓为“海内第一”，洵非夸矣。宋洪丞相著录是碑，讹字凡三：“字孟□”之“孟”，碑作“孟”，洪讹“孟”；“不显”之“不”，碑作“不”，洪讹“不”；“勤恤民殷”之“殷”，碑作“殷”，洪讹“殷”。吾乡魏稼生先生尝据碑本校订《隶释》，章君硕卿欲将其稿本上木，当移书告之，将此三字并是正也。诗第一章“言协坟”，洪氏“言协”下缺一字，今谛审是“经”字。翁苏斋据巴本补洪氏缺字九，此本则于巴本九字外更增一字。诗第二章“鹤鸣一震”，洪书及翁钩本并同，今此本实是“鹤鸣上震”。“一震”本不辞，可见此字宋代已漫漶矣。翁氏《两汉金石记》著录此碑，写“核其妙行”之“妙”作“妙”，而反诬南原《隶辨》作“妙”从“女”非是，今此本实从“女”“少”作“妙”，洪丞相著录亦然。汉碑书“妙”字有作“眇”者，而从“立”者绝未之见。良由翁氏仅见钩本，致有此讹，著录之不可不慎也如此。文内“鲁无君子，斯焉取旃”，与今本《论语》异文，而谊较

[1] 刘德隆、刘瑀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12页。

[2] “题端或引首，在前附页上写的大字碑名或赞语，如是手卷则写于引首处。”见施安昌著：《善本碑帖论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页。

长，翟氏《四书考异》未及征引，当据补。碑版之有稗于经训如此。光绪丙午七月下浣，铁公新得此碑，出以见示，为之篆首，并记数语，以记眼福。上虞罗振玉时同客京都。

末铃“臣玉之印”白文方印、“叔言”朱文方印。

罗振玉的这个题跋是国博本宋拓《刘熊碑》卷轴上最早的一则题跋，也是刘铁云新得拓本后的第一则题跋，由此可见刘铁云和罗振玉的交情匪浅（图4）。罗振玉果然没有辜负刘铁云的“慧眼识人”，他不负刘氏所托，通过翁方纲双钩本将刘铁云此本与沈均初、巴慰祖、江秋史、汪庸夫等人藏本比勘之后，认为其他诸家共存243字，而刘铁云此本存字比诸家藏本多出三分之一，同时铁云此拓本“精采焕发”，验证了沈均初本实际为复刻本！所以，罗振玉认为刘铁云此本当之无愧地堪称“海内第一”！而这个论断也一举奠定了刘铁云藏宋拓《刘熊碑》的学术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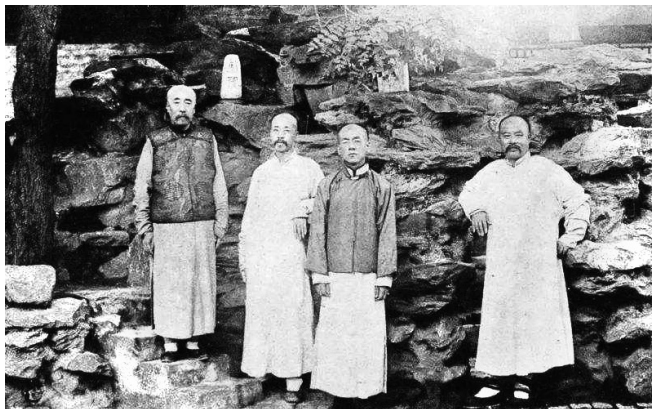


图4 1906年刘鶚（右一）与王瑾（左一）、罗振玉（左二）、方若（左三）合影

题跋二为王瑾于1906年8月8日所作隶书观款：“光绪丙午八月八日，铜梁王瑾孝禹观于都门。”末铃“王”朱文长方印押记一枚。

第二时期，即端方收藏时期。

端方（1861—1911），本为汉族，姓陶，满姓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清末大臣、金石收藏家。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在端方收藏时期，受邀题跋者最多，一时名流如杨守敬、罗振玉、张謇、郑孝胥、李葆恂、章钰、左孝同等十余人纷纷落墨题跋。

1907年3月9日和14日，杨守敬率先为此拓本书写题跋两则，这两则题跋后收入其文集中，见载于《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在文集中，这两则题跋合为一处，名为《刘熊碑跋》^[1]。

题跋三为杨守敬于1907年3月9日所作行书：

《刘熊碑》，明人尚有著录，是碑之亡，当在明之中叶。据陶公言，得此时尚是未装裱本，如天一阁之《华山碑》。然则此碑沉霾于故纸中且数百年，宜国朝金石家未经眼也。罗君叔蕴以《隶释》校之，有不合者三字。然刊《隶释》多讹，未便遽定为洪氏之误。余从日本得影摹十行宋刻《隶释》，惜未携行篋，不得一证其是否也，光绪丁未三月九日邻苏老人记于金陵节署。^[2]

[1] 清·杨守敬著、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24—25页。

[2] “邻苏老人”，《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中作“杨守敬”。

末铃“杨守敬印”白文方印、“星吾审定”白文方印。

题跋四为杨守敬于同月14日所作行书：

前日忆《寒山金石林》有此碑，故以石亡于明代，今以《两汉金石记》考之，乃知顾南原《隶辨》所录之字，即从赵寒山拓本出，然是则赵亦以旧本著录，非其时原石尚存也。又覃溪言巴慰祖本亦是双钩，此外郑谷口天一阁本，皆不足二百字^[1]；沈韵初本是重刻，然则此为南宋拓海内孤本无疑。覃溪谓“是碑隶法实在《华山》之上”，此语殊有微契。余曾于李眉生处见王山史本，流美整练，已开唐隶之先。此则纯古浑沦，实为中郎之遗。且《华山》海内尚有数本，此则少二寡双，语其珍秘，固应有轩轻之分也。十四日，守敬再记。

末铃“邻苏老人”朱文方印。

题跋五为罗振玉于1907年4月所作楷书：

此本去岁藏丹徒刘氏，曾留敝斋饱观三日。今归匊斋尚书，益为此碑庆得所矣。丁未四月道出金陵重拜观再题记。上虞罗振玉。

题跋六为张謇于1907年4月所作行书：

昔常临范氏天一阁本数十过，今见此本，肃然增敬，开寤不少。光绪丁未四月，张謇拜观并观。

末铃“吴国男子张謇”白文方印。

题跋七为郑孝胥于1907年6月所作行书：

图经茫昧失著龟，文字传讹苦异词。望古能持《王建集》，临池应信蔡邕碑。匊斋尚书命题，丁未六月孝胥用王建原韵。

末铃“太”朱文方印、“夷”朱文方印、“海藏楼”朱文长方印。

题跋八为李葆恂（图5）于1907年6月所作行书：

苍苔埋字土埋龟，风雨绢磨绝妙辞。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题酸枣令刘熊碑》，王建。右诗见宋刻《王建集》第九卷。匊斋尚书近获此拓，命为题记，谨大书此诗于右，以谗来世。按：汉碑具书人名者，不三四见，最负书名如蔡中郎，当时穹碑巨制固应多有，而亦绝不一见，金石家以为恨，则往往悬拟附会以为重。如《夏承碑》以芝英体谓之中

[1] “皆不足二百字”，《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中脱“二”字。



图5 1901年端方（左一坐者）与李葆恂（右一执扇者）、锡春臣（右二）、黄左臣（右三）、程伯臧（左二）合影

郎；《华岳庙碑》明署郭香察书，亦谓之中郎。（前辈谓察莅中郎之书，无论“察书”二字不概见，抑岂有不著书人而反著察书者耶？）^[1]吾皆不敢附和。如《郭林宗碑》似最可信矣，然中郎止云撰文无愧色，不云书也，吾仍不敢遽谓之中郎。惟此碑以唐人据图经定为中郎，良可据依。盖唐去汉未远，古籍尚多，非灼然可信，必不轻为此诗。非嘉祐中张稚圭辄云据图题记者比也，然则此碑实古今第一可信中郎书，特是片楮沉埋故纸堆中几百余年，金石老学无一获寓目者，而葆恂获摩挲玩赏三日之久，且与公新得关中本《华岳庙碑》并几校观，自谓多生于楞严会上获眼根圆通不少，欢喜赞叹，辄纵笔题此，不自知其言之澶漫也。光绪丁未六月望，义州李葆恂题记。

末铃“子恂”朱文方印。

题跋九为章钰于1907年7月17日所作行书：

篆如李斯，隶如蔡邕，尚矣！匋斋师于上蔡遗迹搜罗殆尽，言先秦文字者推为渊藪。日者，又出中郎《刘熊碑》命读，目眩神夺，惟有赞叹！汉石经既归篋衍，此碑尤称希世之珍，伯喈有灵，庆得所矣！私尝持论以为古人亡矣，文字则其精神所寄，亡而未亡者也。苍茫寥廓中时时求一二贤主人以托其命，而惟与古为契、沆瀣如一者，则神交冥会，欣然投之，气机翕应，自然而然，匪第物聚所好之谓也！师主持风会于国粹，所寓竺耆而孱守之，故海内大宝如百川赴壑，有迎无拒，此碑为当世学子所闻而未见者。门墙下士得从旁寓目，亦自幸墨缘之非浅矣。率臆书之，敬质观者。光绪丁未六月十七日，长洲章钰谨记。

[1] 括号内文字，题跋原文为小字。

题跋十为左孝同于1908年3月所作行书：

谷口（郑氏簠有拓本，竹垞曾见之）^[1]寒山（《隶辨》中所有此碑之字，俱摹自赵凡夫藏本）与甬东（天一阁），久传妙迹互争雄。惊看照乘珠腾采，应出三家鼎足中（碑久不存，传拓极少，此本或即三家所藏之一）。摩挲玉轴眼频揩，古墨曾闻属伯喈（唐人王建有诗）。什袭双钩一残本，欲将享帚笑苏斋（翁覃溪所见仅巴俊堂双钩残本）。匋斋尚书命题。戊申三月，湘阴左孝同。

末铃“邃靖侯四子”白文长方印、“左孝同印”白文方印、“子异”朱文方印。

题跋十一为杨守敬于1908年3月所作行书：

前年但据罗叔韞谓亲见沈均初本，确是复刻，故深信不疑。今见沈本，的非复刻，但拓之在后耳。又以知余前跋谓是碑之亡，在明之中叶，寒山赵氏所录非必据旧拓也。宣统元年三月，守敬重观题。

末铃“杨守敬”白文方印。

杨守敬在题跋中谈了一点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最初听罗振玉讲沈均初本是翻刻本，并深信不疑，但是当他见到沈本后，又改变了看法，认为沈本并非翻刻本，只是传拓时间较晚一些而已。相比于罗振玉的详加比勘而言，杨守敬并没有说出自己看法的相关依据。

题跋十二为杨守敬于1908年3月所作行书：

洪氏所录，碑尚未断，而下截磨泐缺字却未核，故翁氏图之，每行字多寡不一。今以此整本计之，碑廿九行，行三十三字。翁图惟十二行、十四行、十六行、二十一行为得之，良以其未见整本故也。赵益甫驳翁图，前四行阙字失写，不知其自图每行三十二字，尚行失一字也。益甫好轻议前人，不自觉其武断。吾于《补寰宇访碑录》见之矣。宣统元年三月，守敬重观复题。时年七十有二。

末铃“杨守敬印”白文方印。

题跋十三为允升于1908年2月23日楷书观款：

宣统二年二月廿三日，徐世昌、铁良、李葆恂、升允同观于宝华庵。升允题。

题跋十四为志锐于1911年3月26日所作楷书：

[1] 括号内文字，题跋原文为双行小字。

宣统辛亥三月二十六日，陶氏博物馆同观者赵尔巽、荣庆、赵尔萃、陶葆廉、刘师培、赵世基、于式枚、李家驹、志铤、郑孝胥、袁克定、金还、叶景葵、许鼎霖、余建侯、孙桂澄。志锐题记。

第三时期为完颜衡永收藏时期。

完颜衡永（1881—1965），又名王衡永，字湘南，号“衡亮生”“衡酒仙”“寸园酒仙”等。

1911年11月，端方身故，其所藏《刘熊碑》拓本逐渐流落散佚；直至1918年，完颜衡永在碑帖市肆中得到此拓本并率先题跋。

题跋十五为完颜衡永于1918年所作楷书：

《季子孟阳碑》久佚，此拓雪堂称第一。未剪人间孤本存，赵宋精拓墨如漆。当年曾藏铁云家，后归宝华庵珍秘。戊午市肆碑忽见，斯时始识庐山面。虽然全豹未获窥，字多覃溪令人美。况是原拓易千金，朝夕临摹直到今。世间三本此为最（范氏天一阁本已付劫灰，巴慰祖本存字无此本多，其余沈均初、江秋史、汪庸夫等复刻本，皆不足论。翁覃溪藏双钩本号称字为最多，今较此本，比伊本多三之一矣）^[1]，足慰多年好古心。酸枣残碑志原委，摊笺灯下借间吟。长白完颜衡湘南未定草。

末钤“衡酒仙读碑记”朱文方印、“酒仙所藏金石”白文方印。

完颜衡永以藏主身份，认为沈均初、江秋史、汪庸夫等其他诸本“皆不足论”，且认为天一阁本已经不存于世，而巴慰祖双钩本源出天一阁本，存字较此本为少，完颜衡永遂推此本为当世最善之本。

题跋十六为胡嗣瑗于1934年4月10日所作楷书观跋：

康德癸未四月十日，玉牒溥忻、溥仲、江安傅增湘、侯官郭则沅、大兴恽宝惠、长白魁瀛、开州胡嗣瑗集寸园同观。嗣瑗题记。

题跋十七为溥修于1941年所作楷书观款：

康德七年五月，溥修观并识。

题跋十八为张玮于1961年冬所作楷书：

四十年前曾见《汉圉令赵君碑》，已叹观止。不意迟暮之年，又因稚簧许丈于酒仙斋中得见此碑，眼福不浅，八十光阴未虚度矣！辛丑大寒，敬园敬识。

[1] 括号内文字，原文作双行小字。

末铃“固始张玮徼彬”白文方印、“重游芹泮四渡沧溟”朱文方印。

以上十八则题跋皆有具体年份信息，故可以依次叙之。另有五则无落款年月的题跋，亦整理、附录于后。

题跋十九为程志和行书观款：

新建程志和敬观。

末铃“志和长寿”白文圆印。

题跋二十为俞陞云^[1]楷书：

河朔贞珉失，炎刘宝刻携。郡名诤秀水，快事轶覃溪。迹已俞乡远，文应华岳齐。江亭怀雪夜，然烛更留题。曩岁曾题《雪夜看碑图》。德清俞陞云阶青。

末铃“阶青”朱文方印。

题跋二十一为李葆恂行书：

神物当天，历代宝之。摹刘文清题关中本《华岳庙碑》装本篋上书。李葆恂。

末铃“猛庵”朱文方印。

题跋二十二为缪荃孙楷书：

《酸枣令刘熊碑》，碑久佚。《集古录目》《金石录》《隶释》《宝刻丛编》《汉隶字原》《金薤琳琅》《寒山金石林》《隶辨》《两汉金石记》均著录考证，以《隶释》及翁记为最详。欧未见碑额，但据碑云君讳熊，字孟缺，广陵海西人，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因名《俞乡侯季子碑》，并云当在扬州。洪氏见篆额，并据《水经注》定为《酸枣令刘孟阳碑》，言碑在酸枣，而正欧公碑名及碑地之误。洪述赵语，以熊为彪之弟，翁据熊方《补后汉同姓王侯表》，证熊当为彪之子，不得云彪弟。洪氏但执平封俞乡，又不知彪之封号，漫尔谓碑为误，殊为无据。所考皆确。洪又举王建诗、苏迈书胡戡之语，谓此为《刘宽碑》同，皆中郎书，建诗为不诬，洪独以为非。不知以为中郎书者，不仅王建一诗，唐张祐《题酸枣驿前碑》云：“苍苔古涩字凋疏，谁道中郎笔力余。长爱当时遇王粲，每来碑下不关书。”更足为中郎书添一确据矣。酸枣，今延津，不知尚可踪迹否？江阴缪荃孙识。

[1] 俞陞云（1868—1950）字阶青，别号“斐庵”“乐静”“乐静居士”，晚号“乐静老人”“存影老人”“娱堪老人”，室名“乐静堂”“绚华室”。浙江德清人，清末朴学大师俞樾之孙、俞平伯之父。光绪二十四年（1898）殿试中一甲探花，授编修；后任浙江省图书馆监督、清史馆协修。著《小竹里馆吟草》《乐青词》《蜀鞬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乐静吟》《清代闺秀诗话》等。

首钤引首章“江阴”朱文长方印，末钤“荃孙”朱文长方印。

缪荃孙此跋主要谈论了以往金石学家们关于刘熊家世的讨论，他坚持认为《刘熊碑》为蔡邕所书。

题跋二十三为李瑞清楷书：

隶书，汉代独崇中郎，论者以《刘熊》为中郎书，然汉代书家多不题名，故评者如聚讼。或以偏旁损益以辨其为蔡书否，陋矣！大约汉代书家，多尚方整，而中郎一变从衡，时人遂相与惊异。且用笔微带章草法，观世称《夏承》《华山》为中郎书，可以悟蔡法矣。是碑体势近《史晨》，而其超逸则非它碑所及，朱秀水比之《衡方》，殆以臆度评之耶？匋斋尚书命题，李瑞清。

李瑞清这则题跋主要驳斥了将《刘熊碑》附会为蔡邕书的说法，他的依据与此前诸家不同，李瑞清从书法的用笔角度进行了辨析，在众多的题跋中别有新意，显示了其思考和看待问题的独特视野。

通过以上20多则题跋来看，诸家所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碑主刘熊的身份；二是《刘熊碑》是否为蔡邕所书；三是《刘熊碑》的流传和著录问题。

在这张珍贵的拓本之上，罗振玉、杨守敬、缪荃孙、李瑞清等数十位金石学家、书法家、收藏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也形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刘熊碑》学术史和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刘熊碑》的金石学传播

《刘熊碑》自刻立之后，便备受金石学者和书画家们的广泛关注，北魏以后，代不乏人。由于拓片罕见，晚清民国的金石书画家们甚至以“双钩”的方式将《刘熊碑》钩摹出来，用以研究、收藏和朋辈师友间的馈赠。

（一）金石学家与《刘熊碑》

东汉末期，《刘熊碑》刻立于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的酸枣县城北。

北魏后期，酈道元（466—527）在其《水经注》中率先著录了《刘熊碑》的位置等基本情况。

唐代中期，诗人王建（765—830）作七言绝句《题酸枣令刘熊碑》：“苍苔满字土埋龟，风雨销磨绝妙词。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1]王建据图经类地理类古籍之相关记载认为，此碑为东汉大书法家蔡邕所书。这一说法影响了1000多年，后世为此争讼不休。

同样生活于唐代中期的诗人张祜（约785—849）也作了一首关于《刘熊碑》的诗——《题酸枣驿前碑》：“苍苔古涩自雕疏，谁道中郎笔力余。长爱当时遇王粲，每来碑下不关书。”从张祜的

[1] 唐·王建著、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07页。

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唐时期，《刘熊碑》是“蔡邕书”的说法流传甚广，而对于这种说法合理与否的辨析则直到宋代才充分展开。

北宋治平元年（1064）六月五日，欧阳修为《刘熊碑》拓本写下了《后汉兪乡侯季子碑》的跋语，描述了碑文损泐情况，并认为《刘熊碑》“据碑文无卒葬年月，而其辞若此，似是德政碑”。^[1]

成书于南宋乾道三年（1166）的《隶释》，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和著录《刘熊碑》文字内容的金石学著作，并开创性地否定了前人的错误说法。作者洪适在《隶释》卷五首先整理了《刘熊碑》的碑阳和碑阴的文字内容，存字、缺字情况，悉录之如实，并且还对碑额残字也进行了描述；接着又回顾了此前酈道元的《水经注》、唐人王建诗以及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中的相关《刘熊碑》的内容，指出了《刘熊碑》的碑文书法既非“蔡邕书”，同时碑文内容文辞也并不是唐人王建诗中所说的“绝妙词”：

予谓此（《刘熊碑》）固汉隶之上品，似非中郎笔法！其文有云：“七业勃然而兴，咸居今而好古。”其诗则曰：“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文律如此，难以谓之绝妙辞也！^[2]

除此以外，洪适还指出《刘熊碑》碑文中关于刘熊的家世记载与传世文献《古命氏》《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出入，所以洪适认为碑文可能有刻错文字的可能。洪适的记载既详，辨析得力，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后世金石学家或采纳其说，或对其说展开讨论。可以说，在《刘熊碑》整个传播历程中，洪适是最全面地划定研究焦点的人，后人再也没有超越洪氏提出的这些问题范畴。南宋理宗时期（1205—1264）的刻书家、藏书家陈思在其《宝刻丛编》中记载了“汉酸枣令刘熊碑”，其内容皆节选自《隶释》中的相关记载。



图6 《刘熊碑》碑阴残石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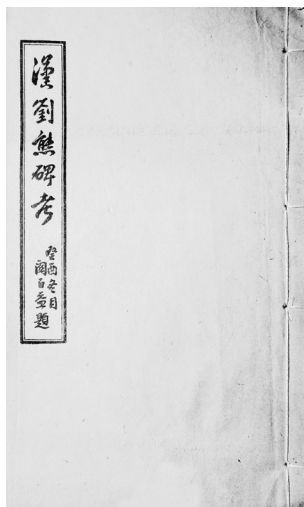


图7 顾燮光《汉刘熊碑考》

[1] 宋·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七），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90页。

[2] 宋·洪适著：《隶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页。

从唐人王建到宋人洪适，我们可以窥见，在金石学的研究和思考层面，宋代要远迈于前代。

明代万历年间的藏书家张萱（约1553—1636）在其学术笔记《疑耀》卷六中著“刘熊碑”一条，张萱表示赞同宋代洪适的观点，同时对《刘熊碑》并非“蔡邕书”进一步做了辅助论证：“既非中郎之词，又安得云中郎之笔？盖东汉诸碑，流俗多以为中郎笔，犹王子敬好书《洛神赋》，故世一有《洛神赋》，辄以为子敬书耳。”^[1]

1915年，金石学家顾燮光（1875—1949）于河南延津学舍重新访得《刘熊碑》碑阴残石一块，为此他还专门写了《汉刘熊碑考》一书，辑录前人对此碑的考证文字内容以及数十人题跋（图6、图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启功、王戎等先生将《刘熊碑》的相关问题形成定论，认定《刘熊碑》非“蔡邕书”，而是无名者书；而碑文中关于刘熊的家世记载基本是准确的，^[2]算是回应了南宋洪适提出的问题，堪称千余年来金石学的“异代赏音”！

（二）书画家与《刘熊碑》

《刘熊碑》除了受到金石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之外，那些具有金石学背景的书画家们也纷纷临摹、研究、收藏相关传本，推动了《刘熊碑》研究的繁荣和深入。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巴慰祖和赵之谦。

1. 巴慰祖钩摹《刘熊碑》

巴慰祖（1744—1793），字隽堂，号予藉，安徽歙县人，清代徽派篆刻的重要代表人物，长于隶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巴慰祖将自己从武林（杭州）所得的《刘熊碑》拓本进行了“双钩”并付刊印，他在题跋中记载道：

《酸枣令刘熊碑》《隶释》载全文，欧、赵《录》《目》皆列，以后诸家乃未收入，盖碑久不存矣。顾南原谓寒山赵氏家藏拓本，惜未及见。兹本得于武林，文漫灭已不可识，其存者都计二百七十七字……乾隆辛丑正月立春后五日，歙巴慰祖双钩毕并记。^[3]

通过巴慰祖的记载可知，巴慰祖在1781年之前在杭州得到了《刘熊碑》的拓本，这个拓本存字约217字，巴慰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双钩”完毕后付诸刊刻。

“双钩原是在无法获得真迹（或拓本）的情况下勾勒文字（或图像）的轮廓、聊存梗概的权宜之计。”^[4]《刘熊碑》拓本传世极为罕见，因此，在金石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双钩”《刘熊碑》拓本成为一种新的“时尚”选择。据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记载，晚清时期，“双钩”成为一种潮流：“模勒古碑，古有响拓之法，今人辄喜用双钩。”^[5]黄易、翁方纲、宋葆淳、费念慈、杨守敬

[1] 明·张萱：《疑耀》卷六，四库全书本。

[2] 王戎：《〈刘熊碑〉释读正误》，《考古》1993年第9期。

[3] 清·巴慰祖：《汉酸枣令刘熊碑》册后题跋，清刊本。

[4] 薛龙春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8页。

[5] 清·叶昌炽著、姚文昌点校：《语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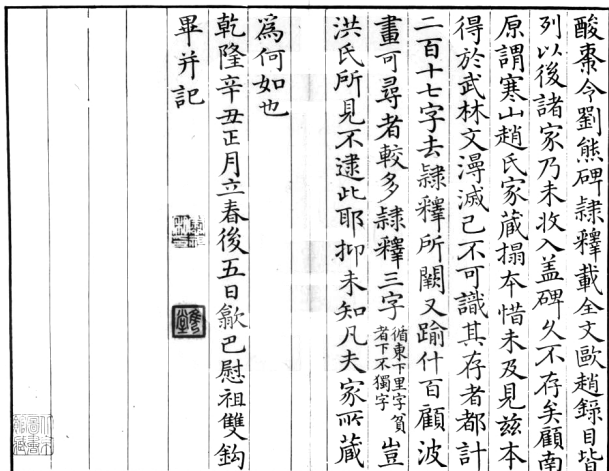


图8 国家图书馆藏《巴慰祖双钩汉酸
枣令刘熊碑》(册后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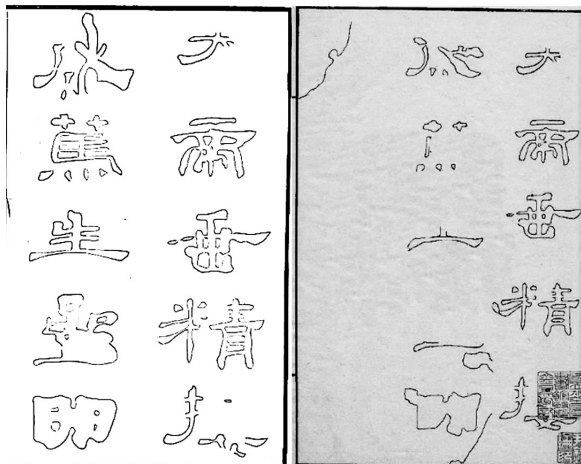


图9 国图藏巴慰祖双钩《刘熊碑》(左)、
翁方纲双钩《刘熊碑》(右)

等人都是这一时期“双钩”拓本的实践者，双钩本既可以用于师友间的馈赠、交换，也可以收藏、出版，极大地促进了金石资料的传播。

巴慰祖双钩《刘熊碑》以后(图8、图9)，翁方纲又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将巴氏双钩本、汪中(容甫)藏本、江德量(秋史)藏本等多种《刘熊碑》传本荟而萃之，形成了一个新的“双钩本”，共得碑文“凡二百四十三字”，比巴慰祖双钩本多出了26字。

2. 赵之谦“遭遇”《刘熊碑》翻刻本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抡叔，号悲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也是清代碑派书法的重要代表人物。

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的好友沈树镛^[1]在北京购得《刘熊碑》拓本，次年三月，赵之谦为之题记，并刊刻“均初藏宝”青田石朱文印(图10)，赵之谦在边款中记载道：

旧藏宋砚一，后刻印，文曰：“仲臣藏宝，盖倒语也。”均初得元拓《刘熊碑》，至宝也，因为摹此，用正意矣。无闷记。

同年，赵之谦为沈树镛依据天一阁本钩摹了《刘熊碑》拓本，是为《天一阁宋拓刘熊碑双钩本》。在给好友魏稼孙的书信中，赵之谦描述了自己钩摹《刘熊碑》的前因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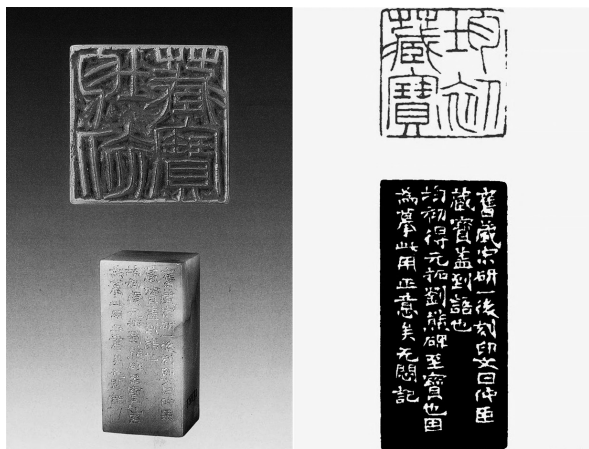


图10 赵之谦篆刻“均初藏宝”朱文印及边款

[1] 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斋号有汉石经室、宝董室、灵寿花馆等。长于收藏，著有《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书画心赏日录》等。

《刘熊碑》世间无拓本，仅天一阁（此最古，多上列十五行，齐梅农双钩一纸，为均初得），汪容甫先生藏本、巴俊堂本皆无可问者。均初忽买到一本，真奇宝也！（明人剪裱本，价尚不昂，卅金。）因为重钩天一阁多字本，别存一册。尽半月之功，考证讹阙，雪中手木，强不知冷，近已装池矣。^[1]

从这封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赵之谦对金石学的痴迷，“雪中手木，强不知冷”！赵之谦对《刘熊碑》的兴趣，除了题跋拓本，双钩摹写之外，还体现在他先后多次临摹《刘熊碑》，将这通碑刻隽秀飘逸、雍容典雅的书风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图11）。

值得注意的是，沈树镛在北京所得的这部《刘熊碑》拓本，赵之谦在其“均初得宝”印章边款中认为是“元拓”；在给好友魏稼孙的书信中认为这个元拓本是“明人剪裱”而成。民国时期，这个沈藏、赵题本在1929年和1935年由中华书局两次影印出版，题名为《原石拓刘熊碑》。经过与国博本、故宫本校勘，我们认为，赵之谦所题此沈藏“元拓本”确实如罗振玉等人所言，“神采殊乏”，与国博本、故宫本气韵充沛、笔力浑厚的趣味悬若霄壤，沈藏本实为《刘熊碑》下半残石的翻刻本（图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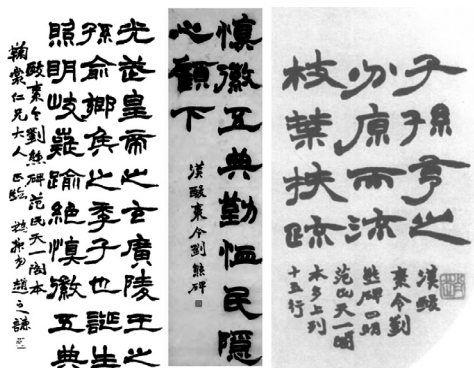


图11 赵之谦《临刘熊碑》^[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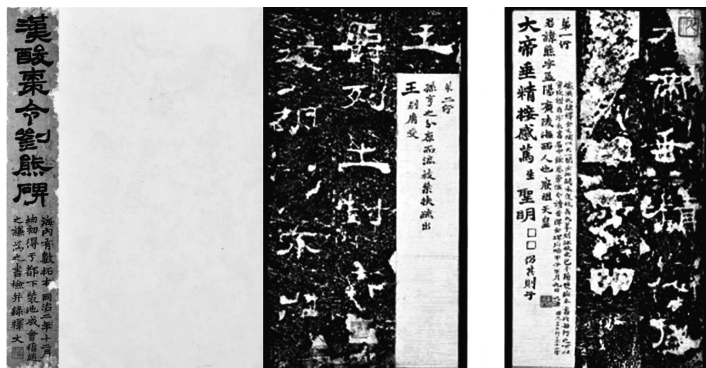


图12 赵之谦题、沈树镛藏《刘熊碑》拓本

一通《刘熊碑》，千载金石史。围绕东汉《刘熊碑》及其传本，在中国古代金石、书画历史上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传播脉络，我们通过梳理《刘熊碑》的研究历史，希望借以窥见中国金石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文献学博士、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定级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 邹涛著：《赵之谦年谱》，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2] 沈树镛所藏拓本，其字画、笔势、笔意皆与传世原石拓本下半段有明显差异。张彦生、王壮弘均认为是翻刻本。见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清·方若原著、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3] 左图采自钟明善著：《中国书法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中图为上海博物馆藏，赵之谦节临《汉酸枣令刘熊碑》；右图采自倪文东著：《扇面书法百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6页。